

王安石的军事思想

姜国柱

(国防大学, 北京 100856)

摘要:王安石作为政治家、改革家,虽没有完整系统的军事著作,但围绕富国强兵这个思想宗旨,而对军事问题多有论述。其军事思想表现在散见的文论中,体现在变法的主张里。王安石提出的“省兵”、“将兵法”、“兵农合一”等军事思想,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王安石;军事思想;积极意义

中图分类号:E292/2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4)01-0023-06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宋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曾被封为“荆国公”,后人称之为“王荆公”。他是北宋著名的改革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青少年时代一直随父母转徙各地,过着宦游的生活。由于生活转徙不定,使他早涉世事,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物,认识了各种情况,尤其是看到了农民的痛苦、地主的贪婪和官吏的横暴,这对他刺激很大。

王安石在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后,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以后的20年中,他在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做官,进一步接触了社会生活,对各种社会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既看到赵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又看到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情景。因此,他期望改革弊政,拯救生民,免于国家“一旦之忧”。他尤其反对土地兼并和贪官污吏的不法行径。这在他的诗文中,多有反映。如说:

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在,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若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鰥茕。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

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他州或告窳,贫富不难平。幽诗出周公,根本诂宜轻。愿书七月篇,一寤上聪明。^[1](卷12《发廩》)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无可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2](卷51《兼并》)

王安石深知土地兼并给广大贫苦农民所带来的灾难,面对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有弥望之田的现实,他主张对兼并土地的奸人和敲剥百姓的贪官,绳之以法,严惩不贷,同时变革弊政,清除鄙风,解除民众之苦,解救国家一旦之忧。

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从提点江东刑狱,赴京述职,写了《上皇帝万言书》,在这篇梁启超称之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3]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做地方官的经验,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以后,王安石在参知政事和宰相任上,积极变法,推行新政,以求富国强兵。

收稿日期:2003-04-06

作者简介:姜国柱(1938—),男,辽宁盖州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军事思想研究。

王安石作为改革家、政治家,虽没有完整系统的军事著作,但围绕富国强兵这个思想宗旨,对军事问题多有论述。他的军事思想表现在散见的文论中,体现在变法的主张里。据此,我们拟对之作些具体的分析论证。

我们知道,宋朝统治者开国之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之患,即“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4]的实际,便对军队和军事机构,实行了严密的控制、防范。同时实行了募兵制,以“扰役强悍,销弭争乱”,以使反抗力量变成维护统治者的工具。募兵制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给北宋王朝带来不少弊病:一是军队剧增,军费膨胀。宋太祖末年,军队人数为 37 800 人,到宋仁宗庆历年间,竟增至 1 259 000 人。由于军队增加,军饷优厚,军费开支竟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二是兵不知农,骄惰无用。由于军队脱离生产,兵农分离,养成了骄惰习性,致使军队腐败而无战斗力。欧阳修对北宋军队的腐败无用的情况,曾深刻揭露道:“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年矣。兵尝经用者,老死今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前日西边之吏,如高化齐宗举两用兵而两辄败,此其效也。夫使就兵耐辛苦而能斗战,惟耗农民为之,可也。奈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5]北宋的军队,饱于衣食,不能吃苦,不能战斗,屡战屡败,却十分骄横懒惰,只有为军之虚名,而无可战之兵卒。因此,欧阳修主张改革募兵制,实行“兵农合一”,以求“兴利除害”,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针对北宋军队之弊,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阐明了自己的军事思想主张。

王安石认为,与其养活庞大骄惰、无战斗力而消耗国家大量财物的“冗兵”,无用之兵,不如择将省兵,裁减骄惰之兵,加以固边措施,便可以固国安民了。基于这种认识,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省兵”之策。他说:

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王功所由

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2](卷 51《省兵》)

王安石亦深知宋兵“骄惰习已久”,而不能桑田之弊,所以提出裁减“冗兵”的“省兵”主张。

王安石的“省兵”主张,与当时其他的省兵主张有所不同。他不是简单地、立即实行省兵政策,而认为要省兵却不能马上实行省兵。他认为,当务之急,不是省兵,而是择将。正因为“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所以才造成了边防疲弱,边患频仍。在这种形势下,简单地、尽快地实行省兵,便会招致更大的失败、祸患。保持兵力,方可“以众抗彼寡,虽危犹幸全”。如果骤然省兵减员,必然造成“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的危局,故不能骤然省兵,简单地实行裁员。再者,由于当时军队骄惰积习已久,即使裁减下来,也不能植桑耕田,从事生产,却照样领取军饷,衣食仍旧如兵。因此,立即省兵减员,却削弱了战斗力,而不能减轻国家支出和社会负担。有鉴于此,王安石认为,当务之急是择将,选择有用的将才,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固边抗敌,解除边患。

王安石进一步指出,“兵”是一定要省、要减的,但要选择时机,见机而行,不可盲动。在各种条件都具备,即经过改革后,克服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弊政,抑制了土地兼并,使游惰之民尽归其田,百官勤政清廉爱民,将帅尽职统兵御敌,这时便可以“省兵”而“精兵”了,即“省兵果有年”之时。王安石把“省兵”等军队的改革,与政治、经济的改革,紧密地联系起来,通盘筹划,以求治国、富民、强兵,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从这种思想认识出发,王安石提出一整套的理财富国、富国强兵的改革主张。

王安石指出,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就必须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只有这样,才能供给军队充足的财物,养活强大的军队,使军需物资充裕,源源不断,如同人的血脉畅通不绝,如此军队方可强大;否则,国家财寡,兵用窘迫,无物资供应军需,如同人的血脉阻塞不通,军队必然削弱。他针对当时“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而使国家“穷空”、军队“食窘”的状况,提出开源节流、富国强兵的措施。他说:

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

之天地。……今岁东南饥馑如此,汴水又绝,其经画固劳心。私窃度之,京师兵食宜窘,薪刍百谷之价亦必踊,以谓宜料畿兵之弩怯者就食诸郡,可以舒漕挽之急。古人论天下之兵,以为犹人之血脉,不及则枯,聚则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势也。^[1]

(卷5《与马运判书》)

国家不注意发展生产,利用、开发各种自然资源,以增加财富,又不注意节约开支,结果造成国贫民穷而兵弱,遇到了自然灾害,便出现饥馑之象,使谷物价格飞涨,而使兵之粮草短缺、血脉不通。只有发展生产,分使就食,才是疏通血脉之举。

据此,王安石极为重视理财而富国、富国而强兵的问题,这也是他实行“熙宁新法”的宗旨、目的。他在《乞制置三司条例》中,明确道出:

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今天下财用窘急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划刷,殆无余藏,诸司财用事往往为伏匿不敢实言,以备缓急。又忧年计之不足,则多为支移折变,以取之民,纳租税数至或倍其本数。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于不产,责于非时,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2](卷31)

这是说,要聚天下之人,就必须具有充足的财富,要有充足的财富,就必须理财,而理财必须以义理之,以义理天下之财,就必须免去劳逸不均之弊,实行货贿有无相取之制,为此要掌握轻重敛散之权。然而当时的执政者,既不懂理财之义,又拘守祖宗弊法,更不掌握轻重敛散之权,任由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弄轻重敛散之权,故使国家财用窘急,军国之用无以供给,民众之财严重匮乏,当然谈不到国用足、民财丰、兵有给了。为摆脱这种窘境,王安石主张实行变法,收轻重敛散之权,发展生产,积蓄财富,以使国足用、民财丰、兵有给。

为了掌握理财富国强兵之权,在收回轻重敛散之权的经济控制权的同时,还要处理好中央政权与地方各级政府权力的关系。王安石根据北宋中央权力过于集中,而造成军事力量极端削弱的弊病,总结

了周、秦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中央权力不能不集中,但也不能过分集中,非如此则不可以固国强兵。他在《周秦本末论》一文中,对之作精辟的分析:

周强末弱本以亡,秦强本弱末以亡,本末惟其称也。周有天下,疆其地为千八百国,制方伯、连率之职,诸侯有不享者,举天下之众以临之,有不道者,合天下之兵以诛之,自以为善计也。及其敝,巨吞细,盛凭弱,而莫之能禁也,以至于亡,无异焉,强末弱本之势然也。

秦戒周之亡,郡而不国,削诸侯之城,销天下之兵聚咸阳,使奸人虽有觊心,无所乘而起,自以为善计也。及其敝,役夫穷匠操钃耒棘矜以鞭笞天下,虽欲全节本朝,无坚城以自婴也,无利兵以自卫也,卒顿颡而臣之。彼驱天下之众以取区区孤立之咸阳,不反掌而亡,无异焉,强本弱末之势然也。后之世变秦之制,郡天下而不国,得之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销其兵,削其城,若犹一也,万一逢秦之变,可胜讳哉?^[2](卷30)

王安石这里所讲的“本”,是指中央、君主的权力,“末”是指地方、诸侯和在外将帅的权力。他以“周强末弱本以亡,秦强本弱末以亡”的历史事实,说明“强末弱本”和“强本弱末”,都是危亡之道,只有合理地分配、掌握中央与地方、君主与将帅、天子与诸侯的权力,使之适当、相称、合宜,才能国盛、民安、兵强。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王安石在变法中,一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和加强中央和君主的权力,同时又在削弱中央和君主权力的前提下,给在外统兵御敌的将帅一定的权力。具体措施是改“更戍法”为“将兵法”。把全国军队分为若干“将”(军队编制单位),每一“将”设正、副指挥各一人,授予他们一定的指挥权,使之发挥自己的才能,管理好军队。

王安石深知北宋军队百年来所形成的积弊,特别是由“更戍法”的频繁调动而造成士兵的过度劳扰、兵将分离和军队缺乏训练,以及号令不严所造成的军队指挥的软弱无力。“将兵法”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些积弊,改变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和将兵分离、将帅无权的状况,提高了战斗力。

实行“将兵法”后,宋朝集结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对付辽国和西夏,扭转了以前“守内虚外”的形势,加强了国防力量,实为治军之良策。马端临评论道:“议者以为更番迭戍,无益于事,徒使兵不知将,将不

知兵,缓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慨然更制,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卒,平居训励搜择,无复出戍,外有事而后遣焉。”^[6]施宿肯定:“将兵法”为“制军之良法。”^[7]证明代替“更戍法”的“将兵法”,对当时制军、治军具有重要作用。

王安石总结了北宋开国以来的政治、军事教训,尤其是边事教训和时政之误:

因边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故促使他“内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则外不能无患于夷狄。”^[2](卷20《拟上殿进札子》)

他目睹“内忧外患”的形势,十分忧心,极为关注,对边境之患,边民之苦,尤为重视。他在《河北民》一诗中说: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各戍!”^[2](卷51)

河北边境的人民,面对辽和西夏的侵扰掠夺,家家无法生活。他们常年勤于耕织所生产的布帛、粮食等,全都给官家而与夷狄。天灾人祸,促使河北边民携家带小逃往南方,而南方则是丰年无食,灾年更不用说了。边民悲惨愁苦之状,目不忍睹。所以,边民渴望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而边境无患,衣食足。

为了除掉边境之患,解除边民之苦,王安石主张恢复“兵农合一”的制度,实行屯田制。在王安石看来,由“募兵制”招募来的士卒,大多是“无赖奸猾之人”,这类雇用兵,不仅无战斗力,不能保国疆,御敌寇,而且给国家增加财政开支,成为国家的一大祸患。因此,王安石力主“兵农合一”制:

上(指宋神宗)论所以致国治强,余(指王安石)以为什伍其民而用之,则不可以致国治强,他时固未易议此……陛下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具备,不然无补也。”^[8](王安石《熙宁奏时日记》)

熙宁初,……帝尝问陈升之曰:“侯叔献言义勇上番何如?”王安石曰:“此事似可为,但少须年岁间议之。”升之曰:“今募兵未已,且养上番义勇,则调度尤不易。”安石曰:“言募兵之害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途也。”十二月,帝言:“义勇可使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

乃可议此。”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不然,无补也。”帝以为然,曰:“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两府议上番,……文彦博等又言难使远戍,安石辩之甚力。……熙宁中,王安石言:“募兵未可全罢,民兵则可渐复,至于二广尤不可缓。今中国募禁军往戍南方,多死,害于仁政。陛下诚移军取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杰,使趋为兵,则事甚易成。”于是,苏缄请训练二广洞丁。旧制,一岁教两月。安石曰:“训练之法,当什伍其人,拔其材武之士以为什百之长。自首领以下,各以禄利劝奖,使自勤于阅习,即事艺可成,部分可立,缓急可用。”^[9]

余(指王安石)因为上言募兵之害,终不可经久,余以为如此。余曰:“今募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又五代祸乱之虞终未能去,以此等皆本无赖奸猾之人故也。”^[10](王安石《熙宁奏对日记》)

从以上所援引的历史材料,我们清楚地看到,王安石深知募兵制之害,其中一个大害就是所招募之兵“皆本无赖奸猾之人”。这种兵养之虽多,“及用则患少”。其原因在于“以民与兵为两途”。所以,当宋神宗与诸臣议论民兵之时,王安石历数“数百年募兵之弊”。王安石主张详立法制,果断变革,清除积弊,而致强治军。他把兵制改革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力主“寓兵于农”、“兵农合一”,认为这是必须注意的国家当前的“大政”。因此,他以“词气激烈,笔势低昂,高视一时,下陋千古”^[10]的语言、气势,责备宋神宗“每事尚或依违,牵制流俗,不能一有所立,以为天下长计”^[10],他主张要对募兵制进行果断的改革,以使国治、民富、兵强、边安。

据此,王安石对屯田官员大为称赞,期望他们与当地军民一起努力,不畏劳苦,种植桑麻,驱除兵费,建立功勋,留名青史。他说:

置将从来欲善师,百城蹉跎起毫厘。驱除久费兵符出,按抚纷烦使节移。恩泽易行穷苦后,功名常见急难时。孺文此日风流在,直笔他年岂愧辞!”^[2](卷57《送苏屯田广西转运》)

盘礴西南江与岷,石犀金马世称神。桑麻接畛余无地,锦绣连城别有春。结纆

相随通籍入,推车此去辟书新。知君不为山川险,便忘吾家叱驭人。”^[2](卷57《送复之屯田赴成都》)

可见,王安石对于屯田有功的边官、边将是充分肯定和赞扬的,从而表明了他的治军心迹和兵制主张。

王安石主张改革兵制,实行屯田,兵农合一,不是为了扩张侵略,而是为了“和戎”固边、安民保土。他指出,更张改革虽有“数千百事”,但归纳起来是“五事”:“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他把“和戎”列为“五事”之首,并指出“今青唐、洮、河,幅员三千余里,举戎羌之众二十万献其地,因为熟户,则和戎之策已效矣。”^[2](卷1《上五事书》)通过“和戎”政策,与“戎狄”和睦相处,不用战争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消除边民之患,亦是王安石所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王安石的军事思想,还通过阐释和发挥老子的军事谋略而具体展现出来。

我们知道老子肯定“兵为凶器”,主张“不以兵强天下”,“战而有果”,“胜而不美”等。王安石对此表示赞同,并作了发展。他在解释《老子》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和“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时,说:

明则人报之,幽则天报之。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人报之也。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者,天报之也。”“用兵者,不过胜而已,故曰‘善者果而已。’”^[11](32页)

有道之君、之臣,都不以兵强天下。因为战争是杀人之物,杀人之父、之兄,人亦必报而杀之。再说战争也是耗财之物,战争之后,人死财亡,田园荒芜,荆棘丛生,必有凶年。所以,迫不得已而进行的战争,胜利之后,定要罢兵,不可穷追不舍,战斗不止,而要适可而止,战而有果。

王安石接着说明了“兵为凶器”,“有道者不处”的道理。他在解释《老子》第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时,说:

佳兵者,坚甲利兵也。兵,凶器也,所以为不祥之器。前篇言之已详。万物无有不被其凶害者,故恶之。有道者以慈为心,故不处。”“兵者,凶器,动则万物尚恶,故有道者必无处此。”^[11](32-33页)

兵为凶险、不祥之器,战争为杀人、耗财之物,所以,有道者不以玩兵为务,而要以恬淡为上,胜而不美。

不得已而战之,战争胜利了,也不要洋洋得意,弹冠相庆。如果以战争胜利而美,则是以杀人为乐。因此,不可以穷兵黩武,炫耀武力,发动战争而得天下。王安石说:

夫战非得已也。非得已,则虽胜犹不足以为善。胜而为善者,乐致人于死矣。此所以‘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是也。^[11](33页)

王安石反对战争的战争观,与老子一脉相承。这是中国古代战争观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内容,亦是中国人民的一贯主张。

王安石进一步指出,对待兵、战争这个凶险、不祥之器,不可凭感情用事,不可以兵逞强,而要“无兵而活”,“多谋善胜”。他说:

庄子曰:“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勇于敢,以不必必之,故多兵而杀。勇于不敢,以必不必,故无兵而活。”^[11](57页)

以其常易,故坦然;以其知险,故善谋。^[11](58页)

王安石认为,用兵作战,要顺天应人,不可强行。《老子》第七十三章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招而自来。”人要效法天道,与时偕行,坦然处之,不以个人喜怒而发动战争、对待战争,要“善谋”,“不怒则善战”^[11](56页),以此而求“善胜”,这才是智者之用兵。

王安石深知宇宙万物对立面之间的矛盾和敌我双方的力量强弱,都是可以转化的。他发挥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强调以弱胜强的策略,并对之作作了反复的论证:

天下之人常为阴阳转徙而不知反,故欲张者必歛,欲强者必弱,知雄之为动而当守其雌,知白之为明而当守其黑。故处之以歛则天下之张皆归之,而不为彼之所歛。持之以弱,则天下之强皆归之,而不为彼之所弱。”^[11](卷36)

道之用所以在于弱者,以虚而已。即在天者而观之:指我亦胜我,蹈我亦胜我,则风之行乎太虚,可谓弱矣。然无一物不在所鼓舞,无一形不在所披拂,则风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观之:决诸东方则东流,决之西方则西流,则水之托于渊虚,可谓弱矣。然处众人所恶,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则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非所以为动,

然有所谓动者,动于反也。强非所以为强,然有所谓强者,盖弱则能强也。虽然,言反而不言静,言弱而不言强。言动则知反之静,言弱则知用之为强。^[11](卷 39)

王安石明确地认识到,天下万物,诸如阴阳、歛张、强弱、兴废、与夺等等,都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的。他在对《老子》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解释中,详细地阐发了这些思想,尤其是以弱胜强的思想。他指出,“在天者而观之”,“风”是弱者,但却能吹拂万物而动;“在地者而观之”,“水”是弱者,但却能攻破坚强者。以此证明:弱则能强,弱能胜强。这是宇宙万物中普遍存在的法则。

王安石由这个宇宙万物中普遍存在的法则出发,肯定各个领域,尤其是战争中,弱可以转化为强而最终战胜强。他说:

弱之胜强,道之妙用。如水至弱,能攻坚强。^[11](40 页)

《字说》曰:屋梁两端,乘实如之。物之强者莫如梁。所谓强梁者,如梁之强。人之强者,死之徒也。子路好勇,‘不得其死’。‘羿善射,羿荡舟,俱不得其然。’是皆失柔弱之义也。^[11](41 页)

天下之至柔弱的水,而能攻坚强,由此可以证明柔弱胜刚强。所谓“强梁不得其死”,就是这个道理。因此,王安石称赞老子“夫慈以战则胜”,肯定战争中也可以柔弱胜刚强,以弱而胜强。这种把宇宙辩证法运用到战争中,当然是合理的。

王安石的柔弱胜刚强,并不是单纯而消极的守柔弱,而是积极而有为的转弱为强的思想。他认为,人应当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做好转化工作,由弱变强而最终胜强。因此,他反对老子的消极无为,力主积极有为,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他说:

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故圣人唯务修其成万物者,不言其生

万物者,盖生者尸之于自然,非人力之所得与矣。老子者,独不然,以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为也,故抵去礼、乐、刑、政而唯道之称焉。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2](卷 27《老子》)

王安石认为,“道”有本、末两个方面内容、作用。本是生万物的自然之道,不需要人力干预而万物自然而生长,即使是圣人也是不能言、不能为的。末是成万物的社会之事,需要人力加工而促使万物成功,这是圣人所能言、所能为的,如礼、乐、刑、政四术,就是如此。这是说,生万物的自然之道是人力不可为的,成万物的社会之事是人所能为的。然而老子则不是这种认识,他认为社会之事亦是人力所不可为的,故得出消极无为的观点,这是不察于理的好高骛远之论。王安石对老子消极无为之论,极力反对,以积极有为的态度,推行新法,改革弊政,以求富国强兵,实现文武并兴、并行之道。

王安石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国富兵强,就必须做到文武兼备、并行,二者都不可或缺、偏废。他在一系列的文论中,都阐发了这个思想主张,强调文武不是异事、二途。通过改革吏治、教育,为国家培养文能治国、武能统兵的人才,如此则国治而兵强了。

王安石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改革家、政治家,其军事思想与政治、经济改革密切相关,其最终目的是富国、济民、强兵,这在当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在当今亦有其思想价值。

参考文献:

- [1]临川先生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2]王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3]王安石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36.
- [4]范浚.五代论[A].香溪集(卷 4)[M].
- [5]欧阳修.居士外集(卷 9)·时论·原弊[A].欧阳修全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6]文献通考·兵考五[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7]嘉泰会稽志(卷 3)[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8]陈璘.四明尊先集·论兵门(卷 7)[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9]脱脱.宋史·兵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0]朱熹.跋王荆公进鄧侯遣事奏稿[A].朱熹集(卷 83)[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 [11]王安石老子注释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9.

(英译下转第 35 页)

知“道”循“道”卫“道”的楷模。从他一生的事迹可以看到,作为思想家的文天祥与一般的学者不同的是:他不仅以理论的探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以其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他所服膺的儒学之基本价值,从而耸立起一座儒家人格精神的历史丰碑,让世人在敬仰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和人格上的锤炼。

有学者论证,文天祥的思想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因此,与程朱唯心主义理学是相对立的。此说未免有简单化的倾向。无论从师承方面,还是从文天祥思想的核心来看,特别是从文天祥的人格精神、道德实践等诸方面来考量,文天祥的思想与行为皆是宋明理学这棵树上结出来的“果”。

概而言之,文天祥既是一位富有创发性的儒家学者,又是一名政治家,朝廷重臣。他生逢南宋灭亡之际,其遭遇的艰难险阻匪夷所思,其面临的生死考验令人难以想像,而他在儒学史上最大的贡献也许并不在理论上,而在其人格精神,在其生死抉择所凝固而成的忠臣义士的形象;也可以说,文天祥是程朱理学的人格化。全谢山有言云:“巽斋之宗晦

翁,不知所自。……然巽斋之门有文山,径坂之门有叠山,可以见宋儒讲学之无负于国矣。”^[5](2944页)因此,是程朱理学倡义理崇人伦滋润培育了文山,而文山亦因此而无负于国,无负于民族大义,亦无负于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不朽伟业。

参考文献:

- [1]脱脱.宋史·文天祥传(卷418)[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文天祥全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 [3]朱熹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
- [4]张载集·正蒙·乾称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8.
- [5]宋元学案·巽斋学案(卷88)[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朱子语类·理气上·太极天地上(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7]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杂著·读大记(卷70)[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

On Wen Tianxiang's Confucian Thought and Spirit of Personality

ZHENG Xiao-jiang¹, HUANG Yong²

(1. Dept. of Philosophy,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7, China;

2. School CPC Ji'an Committee, Ji'an, Jiangxi 343000, China)

Abstract: Wen Tianxiang was a politician, writer and thinker. In a word, his spirit of personality embodies this proverb "trying his best to obtain the unattainable goal". This spirit is related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ing (fate, necessity) and Li (principle, we should comply with it). From Wen Tianxiang's thoughts and deeds in all his life, we can say that he was a typical moral hero who struggled forever and knew and complied with and protected "Da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n Tianxiang and other scholars is that he not only left some great spiritual property to us but also practiced the basic Confucian values with his life. We can say that Wen Tianxiang erected a historical milestone which demonstrates Confucian spirit of personality; we can lift our spirit up and mold our personality by studying it.

Key words: Wen Tianxiang; Confucian thoughts; spirit of personality; modern reflection

(责任编辑 王能昌)

(上接第 28 页)

Wang Anshi's Military Thought

JIANG Guo-zhu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Beijing 100856, China)

Abstract: As a politician and a reformer, though having no complete system of military works, Wang Anshi wrote many essays on military subject focusing on the aim of enriching the country by enforcing its military forces. His military thought reflected in his essays showed his proposition of reforms and new policies. He established the military thought of "Reduction of Armaments", "Law of Military Officers and Soldiers", and "As Soldiers and Farmers As Well", which ha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realistic value.

Key words: Wang Anshi; military thought; active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王能昌)